

挥笔百千篇 激浊扬清真健者
文情五十载 知心谈艺更何人

这幅挽联,是1992年秦牧先生去世后,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、民俗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、散文家、北师大中文系89岁教授钟敬文先生撰文,北师大中文系72岁教授郭预衡先生书写的。该书法现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字画库。

秦牧是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,他的散文极具个人特点:题材广泛、知识丰富、谈古论今、旁征博引。秦牧主张散文创作应“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,进行独特的创造”。同时他还提出把个人的散文创作与所生活的社会紧密结合起来。正因如此,秦牧先生的散文不仅“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情逸趣谈之中”,而且还充满了时代精神。

1992年10月14日,秦牧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,享年73岁。因事发突然,秦牧的很多朋友都是事后才得知此噩耗。远在北京的钟敬文老先生,也是在秦牧去世的第三天才知道该消息。

那天中午,钟敬文照例坐在北师大校园家中的小书屋里,随意翻阅着报纸。这时,其子钟少华匆匆拿着当天的《光明日报》走进书房。他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亲:“秦牧同志逝世了。”听到这消息的钟敬文,当时“脑里像受到一种沉重打击,几乎要迸射出火星来”。他不敢相信:这位比他年轻十七八岁的“年轻人”,怎么会这么突然就走了,而且事先没有任何消息说他病重。

第二天清晨,钟敬文很早便醒来,他依旧无法从故人离去的悲伤中走出来。为纪念故去的秦牧,钟老在清晨创作了这首24字挽联。该联不仅概括了秦牧文学创作的主旨,而且还反映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。

从这首诗的第三句“交情五十载”可知,秦牧与钟敬文相识已50年。其实到1992年,他们已相交长达53年。虽然他们年龄相差16岁,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却超越了时间与地域的界限,随着时间的推移,反而变得越来越深厚。

钟敬文,1903年3月20日出生在广东海丰县;秦牧,则是1919年8月19日出生在香港。他们是1939年秋,在广东省韶关(又叫曲江)江边的一个茅草棚中相识的。而他们的相识,源于钟敬文偶然的“一次发现”。

那时,钟敬文与陈原、左恭等人在国民政府第七战区负责编辑刊物《新军》杂志,他们利用办刊积极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。虽然该刊是一本主要针对当地抗日军官及政工人员的时事杂志(主要刊登时局评论、介绍军事知识技能),但因钟敬文等人喜爱文学,故常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进步诗歌、散文。有一天,钟敬文在江边用茅草搭成的编辑部中审稿。突然,他发现一篇谈论托尔斯泰生平与创作的投稿文章。作者署名为“林觉夫”。钟敬文觉得该稿主题很有意思。他饶有兴趣地阅读起来,他越看越喜欢。读完该稿,钟敬文“心里感到一阵痛快,像前人所说的,在空谷里听到足音那样。”他感觉这个叫林觉夫的见解和文字与众不同。

秦牧知道来者不善,他稍微为自己辩解了几句。《中山日报》社长脸色一沉,怫然道:“你好好想一想吧!”

几天后,报社突然下令调秦牧到梅县去做编辑。秦牧当即表示反对。当他与社长理论时,那位社长蛮横地说道:“不行,要么你去,要么你自己解决生活问题。你不必再留在韶关了。”秦牧愤怒地反击道:“留在哪儿是我自己的事,我就是想留在韶关。既然这样,我自己另找工作好了。”就这样,秦牧被报社通知“停薪留职”,其实这就是变相被开除了。之后,秦牧离开报社参加了“回粤战地服务团”,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。后来,又辗转到了桂林、重庆、香港等地,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。

而此时的钟敬文,因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常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牵制,这使得他所从事的有利于抗战和民主的文化编辑工作很难展开。他觉得这样“无所事事”地留在国民党编辑部只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生命,平白无故地添加自己的精神苦恼。“入海屠鲸意壮哉,眼前琐琐负初来”,这两句诗很好地反映了钟敬文当时的心境。恰巧那时,中山大学由云南澂江搬回粤北坪石开课,受该校中文系热情邀请,钟敬文离开了编辑部前往学校任教。

对于秦牧而言,这次见面更是一生难以忘怀。一位颇有名度的作家居然会主动拜访自己这样一个“刚满20岁初出茅庐的无名小伙子”,这对于年青的秦牧来说,实在是意外惊喜。对于那天的场景,已是暮年的秦牧在为老友钟敬文即将出版的《钟敬文生平·思想及著作》作序时,依旧能清晰地记述:

一天,我正在家里休息的时候,突然有个戴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踏进我家来。原来是他看了我编辑的副刊之后,出于好感和关心,前来探视我了。……我对于一位长者,能够这样主动热情地先来拜访一个年轻小子,当时固然十分铭感,多年以后,回想起来,心头仍然充满了温暖的阳光。

随着时光流逝,两位老人对于那次见面的动因表述略有不同。钟敬文记得是自己看了一篇秦牧的投稿,而有了拜访的念头;秦牧则记得是钟敬文看了他所编辑的一本刊物,而产生了来访的想法。无论怎样,那次在韶关江边茅草屋中的“会晤”,拉开了这两位老人长达半世纪的交往。

没过多久,年轻的秦牧由于在《中山日报》副刊发了不少宣传抗战、痛斥汪精卫的文章,引起了该社社长的不满。一天夜里,《中山日报》社长“穿着香芸纱唐装”到编辑部来察看编辑工作。当走到秦牧面前时,他突然对秦牧说道:

“近来外面对你很有些闲话呢!副刊发表一篇文章在骂托派,托派是人家共产党内部的事,与我们何干?我们犯不着帮共产党说话。还有那个《青年动向》周刊,‘青年动向’四个字怎么是朝左的?这是什么意思?你注意到没有?”

秦牧知道来者不善,他稍微为自己辩解了几句。《中山日报》社长脸色一沉,怫然道:“你好好想一想吧!”

秦牧与钟敬文的情谊

□慕津锋



秦牧稍微想了一下,随即在纪念册上写下了

一首白话诗:

忆当年我廿岁还年轻,
一只热情的手叩我柴门。
那之后四十年逝川滚滚,
友谊的琴声总拨个不停。

忘年交长者情令人铭感,
到如今两老头碰杯高吟!

在诗中,秦牧不仅表明他与钟老“认识已经很久很久”,而且还表达了自己对钟敬文先生的深深敬意。对于钟老,秦牧曾有过高度评价:外表看来,钟敬文只是个“恂恂长者”,或者是个“书生型”的人物,但其骨子里是一个性子刚烈之人。只要是认定的事,就会执著始终。

秦牧深知钟敬文对国家、对人民、对社会、对革命有着崇高使命感与责任感。在治学上,他刻苦认真;在工作中,他一丝不苟。

但钟敬文最让秦牧敬佩的是身上那种“不坠青云之志”的品格。在秦牧看来,即使在横逆飞来、历经劫难的时代,钟敬文依旧能保持自己的斗志,从不自怨自艾,更不愿为自己而去麻烦朋友。正所谓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秦牧与钟敬文恰恰都是这样对朋友充满情义之人。秦牧身上那种对朋友的真挚与担当,让曾经身处困境的钟敬文同样感受到了温暖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钟敬文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教,而秦牧则留在广州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。一南一北,远隔千里。1957年,“反右”运动开始后,钟敬文很快被错划为“右派”。秦牧则因受到领导保护,幸运地没有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,但也

被下放到广东揭阳县棋盘农业社参加劳动。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,秦牧冷静地凝视着、思考着。无论外界怎样评价,他对钟敬文这样的“右派”朋友,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本心与真诚。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他都会尽力去关心这些朋友。秦牧毫不在意这些“右派”朋友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。60年代初,秦牧的一次“主动”到访,同样让钟敬文一生难以忘记,

1962年底,秦牧随以周扬为团长,林默涵、赵沨为团员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古巴访问。在那次访问中,中国文化代表团走遍了古巴的六个省,他们还特地参观了古巴消灭美国雇佣军战场所在地的吉隆滩。1963年初,访问团回到北京。一到北京,秦牧便匆匆前往北师大看望刚刚摘掉“右派”帽子的钟敬文。虽然那时钟敬文已被摘帽,但头顶上却依旧存留着深深的“帽痕”(不许参加四清、不许培养研究生等等)。当时,很多学生、亲友对钟敬文都是避之唯恐不及,可秦牧却毫无顾忌,他完全不在意与这位曾经的“右派”交往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。在他心中,钟敬文依旧是那个自己极为尊敬的老师,极为尊重的朋友。他一如既往相信这位老师的人品与文品。

走进老友家中,秦牧像以往一样与钟敬文握手欢谈。交谈中,秦牧的随意与率真让钟敬文一点也没有感觉到“故人的身份已经起了变化”的那种意味。秦牧这种真挚的友情让钟敬文深为感动。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思考的勇气和对朋友的担当,也让钟敬文打从心底里欣赏。

80年代初,有一件“小事”让钟敬文感受到秦牧在学艺上“举亲不避嫌”宝贵的大公无私精神。进入80年代,广东花城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广东现代作家自选集系列丛书,以表彰广东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。最初,在准备出版的作家名单上并没有黄药眠和钟敬文的名字。当秦牧得知后,他很快向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。他认为既然是出版现代广东作家自选集,如果缺少了黄药眠、钟敬文这两位重要作家,那是很不合适的。经过相关部门研究,秦牧的建议最终被采纳。随后在1983—1989年间,花城出版社编辑部多次来京与钟敬文接洽编辑事宜。

正是因为对朋友的真诚与欣赏,使得他们成为了交心的知己。

岁暮赠秦牧

忆君返棹自西洲,万里风涛浩壮游。
十载冰霜花事尽,一宵雷雨瘴氛收。

重光日月需才笔,映雪襟期耻末流。

南海故人京洛客,明湖待泛载春舟。

这是1977年钟敬文先生专门为秦牧创作的友人诗。

在诗中,钟敬文不仅写出了秦牧的高贵品格,更写出了他与秦牧的珍贵友谊。这份友谊历经时间的打磨和洗礼,是那样让人珍惜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现代文学馆)

1

秦牧佚文辑述:

追寻战时的民主与自由

□张露

兵力再扩大占领区域已经是不可能了,在另一方面就说明中国大反攻的时候即将到来。

七、二十四

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,秦牧从《新华日报》以及其他报纸上得到有关苏德战场的消息,结合中国抗日的形势,不仅对两大反法西斯战场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及时的报道,而且对战争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正确预测,他预言日寇在走向衰退,中国大反攻的时刻即将来到。中国和苏联定不会向法西斯屈服的,胜利是属于中苏以及世界人民的。秦牧的预言是正确的,可见他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,也有很强的预判能力。

三

1947年8月西安《书报精华副刊》第10期上登有一篇《美人与名马》的历史小说,署名“秦牧”,经查也是一篇佚文。该刊创于1946年11月,由书报精华社发行。兹列部分如下:

美人与名马

苏东坡的爱婢春娘换了劝酒时用的新鲜的衣服,在房角走来,蒋运使的眼神不觉一亮,直盯住她,连自己对于各派诗客批评的话也终止了。

春娘飞红了脸,旷达的苏东坡微微一笑。当蒋运使的马在院子外一棵柳树边寂寞地踢着蹄,响着鼻子,摇摆着头上的长鬃时,屋子内的客人开始了华筵。

马是江南的名种,不堪寂寞,所以望着落霞,就大声嘶叫,春娘是个知书达礼的人,不堪羞涩,所以在劝酒时十分忸怩。

蒋运使常常偷用眼角去瞟她,直到苏东坡不耐烦的问:

“蒋运使,那么这个问题你觉得怎样呢?”

他才慌忙地答道:“呃,呃,是这样的。”于是才继续谈论诗词。

酒过三巡,一件惊人的事,最低限度是令春娘震惊的事发生了。

醉了酒的蒋运使突然问:“春娘也跟你去吗?”

“路太跋涉,打算送她回家了。”苏东坡不觉停了筷。

蒋运使涎着脸紧紧地提议:“你远行必须好马,我用我这匹骏马换春娘,这行吗?”

苏东坡,真出于春娘意外,他看了春娘一眼,竟然微笑点了点头。

春娘的眼神一黑,几乎瘫倒,但苏蒋两人却哈哈地笑了笑,笑得那么自得

和豪放。

蒋运使霍地站起,走到书桌上取出纸笔立刻笑嘻嘻地题了一首诗:

“不惜双毛二雪蹄
等闲分付赎娘眉。
虽无金勒嘶明月,
知有佳人捧玉卮。”

他题诗的时候,苏东坡走上前去看,春娘也茫然站在旁边。

苏东坡叫一声好,接过笔来题一首——

“春娘别去太匆匆,
无限离情此夜中。
只因山路多险阻,
故将红粉换追风。”

真出乎两个男人意外,春娘忽然无礼地夺过了笔,也写了一首:

“为人莫为妇人身!
苦乐无端总属人,
今日始知人贼畜,
君前碎首又何嗔。”

像一只飞燕一样敏捷,写完了诗的春娘,掷笔下阶,用脚把头碰向石柱,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,都一齐喷了出来,美丽的姑娘,顷刻变成苍白的死尸。

苏东坡和蒋运使都呆住了,死寂中,院子外那匹雪蹄马嘶叫得更加惨厉。

【注】梁简文乐府有《爱妾换马辞》,注上说是淮南王所作,但《独异志》所载的“爱妾换马事”的主角却是魏任城王曹彰;《鸿书》所纪,则为苏东坡春娘换马事,本篇事实,姑从《鸿书》。

秦牧一生写了不少小说,短篇小说《囚秦记》、中篇小说《阴阳关纪事》和长篇小说《愤怒的海》等,但历史小说存下来的只有7篇,后被收入《秦牧杂文》中,因此,《美人与名马》这篇历史小说的发现,对研究秦牧的历史小说具有重要作用。秦牧在谈小说创作时,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历史小说数量比较少,他说:“历史小品是我很喜欢写的一种体裁,可惜忙忙碌碌,为杂事操劳,我没有集中精力大量写它。在这方面,我所选择的题材,都是曾经令自己激动或沉思的历史片段。”他的历史小说,往往以一两个历史人物为中心,取材于中外历史人物的事迹或故事,有时并进行现代化的改写,针砭时弊,讽刺现实,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。

这篇《美人与名马》以苏东坡、春娘和蒋运使为中心,描述了苏东坡被贬黄州的圣旨下达后,苏东坡对于家事的安排以及好友蒋运使为他饯行的场景。

苏东坡,真出于春娘意外,他看了春娘一眼,竟然微笑点了点头。

</